

# 左營清代鳳山縣 舊城聚落出土陶瓷補記

謝明良\*

## 一、前言

1988年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著手發掘的高雄縣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是台灣難得一見經正式考古發掘的歷史時期遺址。依據報告書所引用《高雄市舊地名探索》，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內傳說即鄭成功所設軍屯前鋒尾之所在地。舊城目前仍殘存數段城垣和三座城門，此次發掘的兩處探方，選擇在東門與南門之間，主要也是考慮到該區域與鄭氏軍屯前鋒尾的地理位置最為接近。

兩處探方除了出土若干鐵器、玻璃器、金屬胎磁瑯、銅錢和史前陶片之外，以總數達三千七百餘片的歷史時期陶瓷標本，構成遺址出土物的主要內容。包括後者在內的遺物，已由負責發掘工作的臧振華、高有德、劉益昌三位先生，參酌出土層位，進行了科學的分類和大致的年代判斷，並由臧氏撰寫報告書公開發表。<sup>(1)</sup>數年前，我在此一研究基礎上，結合國外所見相關考古資料，初步考察了遺址出土所謂安平壺的所屬類型及其相對年代。<sup>(2)</sup>爾來屢次接悉國外有關安平壺的出土報

---

\* 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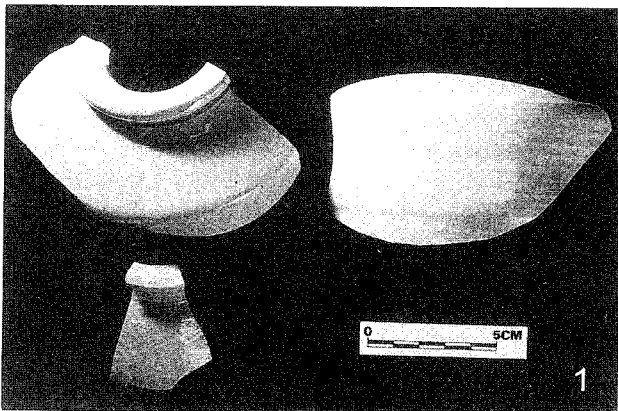
(1) 臧振華，〈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的試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3（1993），頁763～865。

(2) 謝明良，〈安平壺芻議〉，《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1995），頁75～105。

導，覺得有補充的必要，同時也感覺到鳳山舊城聚落所出土的其他陶瓷，可能還隱含著探討台灣早期對外交流的重要線索，故在此試做補記。

## 二、安平壺的年代和產地

因大量出土於台南安平古堡一帶而得名的安平壺，在台灣的分佈頗廣，北自基隆社寮島，南達高雄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圖一）甚至外島小琉球和澎湖都有出土，其中又以台南地區最為集中，數量也最多。（參照表一）雖然我們可以將安平壺的發現地點，結合該地的歷史沿革或傳說，輾轉釐測安平壺的年代約為明末清初，而且發現地點似乎又多與荷蘭人、西班牙人或鄭氏的活動範圍有直接或間接的關連，可說是探索台灣早期歷史極為重要的物證之一。然因缺乏可靠的紀年遺物，故在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在依據層位和共伴遺物推定其大體的相對年代之前，有關釐定安平壺的年代均止於臆測的階段。特別是中國方面，自八〇年代起，陸續公佈的安平壺發現例及其所屬的年代，與台灣遺址所顯現的相對年代差距甚大，這就使得有關台灣早期開發的安平壺年代之確認，愈形迫切。



依據報告書發表年序，中國的安平壺發現例計四處。（參照表二）報告書認為：筆架山窯址附近所採集的安平壺是該窯宋代作品；<sup>(3)</sup> 西沙群島北礁所採集者屬元代浙江龍泉窯製品；<sup>(4)</sup> 福建定海海域打撈上岸的數件安平壺的年代，分別屬於宋代

(3) 廣東省博物館編，《潮州筆架山宋代窯址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頁36及圖版27之6。

(4) 廣東省博物館等，〈廣東省西沙群島北礁發現的古代陶瓷器——第二次文物調查簡報續篇〉，《文物資料叢刊》6（1982），頁159及頁157圖7之6。

表一 台灣遺跡所見安平壺

編號	發現地	備註及文獻出處
1	基隆社寮島	朱鋒，《台南文化》2卷1期（1952）
2	台北縣（瑞芳鎮、貢寮鄉、仁里、舊社）	盛清沂，《台灣文獻》13卷3期（1962）；劉益昌，《凱達格蘭族文化資產保存——搶救核四廠遺址與番仔山古蹟——》（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5）
3	台北縣八里	王淑津女士採訪中研院史語所劉益昌先生的記錄
4	淡水紅毛城	黃士強等，《台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劃第一期研究報告》（台北：中國民族學會，1993）
5	宜蘭縣	（同編號三）
6	新竹新豐鄉明新工專	1996年3月黃信凱先生採集。
7	台中縣外埔鄉	黃士強等，《全省重要古蹟勘察與整修計劃——考古遺址與舊社部份》（台北：交通部觀光局，1980）
8	台中縣大甲東	宋文薰，《考古人類學刊》3期（1954）
9	嘉義民雄	蔡堃元，《雄獅美術》30期（1973）
10	台南（安平古堡、廣濟宮、新豐區大灣、市區土城子、關帝廟、永樂路、五全街、大安醫院、成功大學光復校區等）	連橫，《雅言》（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朱鋒，《台南文化》2卷1期（1952）；江家錦，《台北文物季刊》7卷1期（1958）；林鶴亭，《台北文物季刊》9卷2、3期（1960）；另成大光復校區出土情報係依據賴依縵女士的實見。
11	高雄縣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	臧振華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本第3分（1993）
12	小琉球（烏鬼洞、番仔厝）	國分直一，《民族學研究》18卷1、2期（1954）
13	澎湖（中屯、中西村、馬公、通梁、風櫃等）	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所藏標本

和元代。<sup>(5)</sup> 至於邵城青雲窯址所出標本之年代，於報告書中未具體涉及，不過該窯雖可能延續到明代，但盛燒於元代。<sup>(6)</sup> 此外，依據我個人的實際見聞，現陳列

(5) 中澳合作水下考古專業人員培訓班定海調查發掘隊（俞偉超），〈中國福建連江定海1990年度調查、試掘報告〉，《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總18、19（1992），圖版1之3、6；林果，〈連江定海出水文物〉，《福建文博》1、2（1993），頁105圖3之6。

(6) 傅宋良等，〈邵武四都青雲窯址調查簡報〉，《福建文博》1（1988），頁20圖1之6。但應說明的是，報告書所揭載的安平壺線繪圖（參見本文圖五）與我的實物觀察結果略有出入。筆者手上雖有該窯出土安平壺的清楚圖片，可惜未經同意刊登，在此只好割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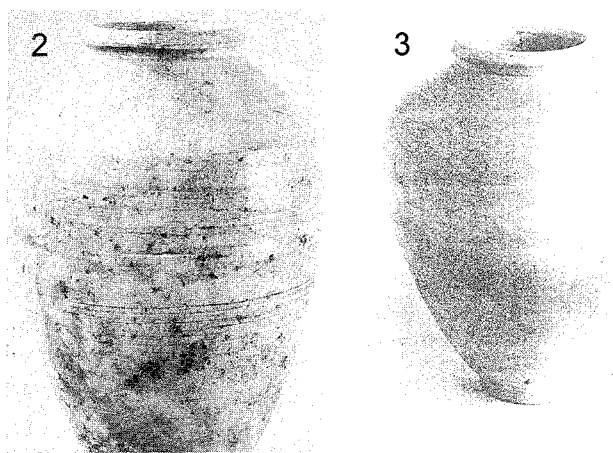
表二 中國遺跡所見安平壺

編號	發現地	數量	文獻出處
1	廣東省潮安縣城潮州鎮東宋代筆架山窯址	1	廣東省博物館，《潮州筆架山宋代窯址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2	西沙群島北礁	1	廣東省博物館等，《文物資料叢刊》6期（1982）
3	福建省連江縣筱埕鄉定海海域	2+	中澳合作水下考古專業人員培訓班定海調查發掘隊，《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8、19期（1992）；林果，《福建文博》1、2期（1993）
4	福建省邵武縣四都青雲後門山窯址	1+	傅宋良等，《福建文博》1期（1988）

於廈門大學人類學博物館的一件安平壺，被標示為宋代骨灰罐；福建德化陶瓷博物館也展示了一件被定為德化碗坪崙窯宋元之作的安平壺……。

由於中國的窯址或其他遺址的出土資料，經常是判別流傳於世同類作品產地和年代的重要依據，因此我們要如何來面對兩地安平壺之三百年以上的差距並自圓其說呢？先不論遺留在台灣的安平壺，是否可能曾經傳世，而後於某一時期同時遭廢棄？也暫不細究俗稱安平壺的這類施釉罐，是否可能沿續燒造數百年而不變其造型和施釉特徵，以及成形技法？只要仔細審視中國方面安平壺的發現情況，可以輕易得知報告者也只是就安平壺的造型及伴出的其他遺物，進行間接的年代推定，並無任何有效的直接證據。本文不擬深究其定年的細節，但想就中國和台灣以外發現的安平壺做一梳理，以做為安平壺編年的參考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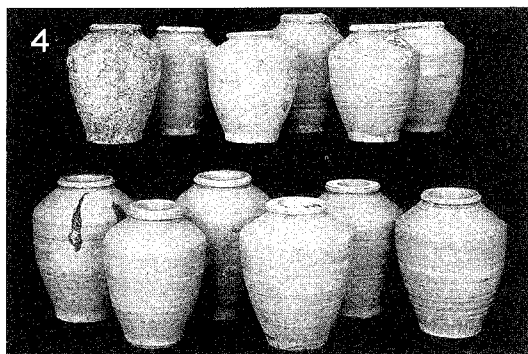
如表三所示，安平壺的相對年代，均為十七世紀，其中又以沈沒於1600年的西班牙旗艦聖迄戈號（San Diego；圖二）、1613年荷蘭籍白獅號（Witte Leeuw；圖三），以及依沈沒地點而命名的1690年荷蘭籍頭頓號（Vung Tau；圖四）等三艘紀年沈船中的安平壺最引人注目。就目前所見安平壺的器形種類和尺寸而言，大致可區分為高近三十公分的大型作品、高近十公分的小型作品，以及最常見的通高在十五～二〇公分之間的中型作品。其中，大型者均屬薄胎、弧肩，小型者均屬厚胎，中型者兼有薄胎和厚胎二式。而不論器壁厚薄，中小型者肩部



多呈斜折肩。一般而言，薄胎作品多施罩灰白或白中略帶牙黃色調的薄釉，露胎處呈灰白色；厚胎作品多施灰白或白中閃青的青白釉，除了灰白胎之外，亦見灰色胎。如果結合沈船紀年作品，並參照大致可判明相對年代的遺址出土的安平壺，似乎可以

認為如聖迄戈號或白獅號之大型薄胎安平壺的相對年代，約為十七世紀初期，中型薄胎作品，有的可早自十七世紀三〇至四〇年代，而同屬中型的厚胎作品的最早絕對年代不明，但晚迄一六九〇年代的頭頓號沈船中仍可見到。至於小型厚胎作品因曾與中型厚胎者共伴出土，故其年代亦應為十七世紀。換言之，厚薄兩式作品的年代雖互有重疊，但薄胎作品的出現似較早，而厚胎作品的沿續時代則更長，並且至遲於一六四〇年代已由弧肩圓弧腹，過渡至肩腹區隔明顯的斜直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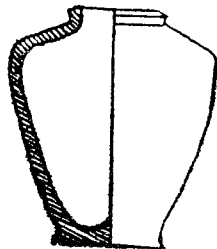
就台灣所見的安平壺而言，目前未能確認有屬於大型薄胎弧肩者，而以中小型折直肩作品最為常見。其次，安平地區的安平壺多屬中型的薄胎灰白釉器，台南市區的安平壺，一般為中型的厚胎青白釉器，<sup>(7)</sup> 結合荷蘭人首先於安平築城，而後發展至台南市區的台灣早期開發史實，亦可檢證經由國外發現例所得之上述二式安平壺的年代序列，大體無誤。無論如何，由以上的安平壺年代觀之，既可印證數十年來，部份台灣前輩學者的推測大致正確，同時可糾正近年來由於中國大陸出土例的錯誤定年而衍生的謬誤。



(7) 朱鋒，〈安平拾錦〉，《台南文化》3：3（1953），頁14～15。

雖然有關安平壺的用途，以往有著種種的推測，不過從其尺寸大小不一及造型特徵來看，似有多種各適其所的功能，不宜一概而論。另從目前所見安平壺的胎釉特徵以及器足旋修技法等，推測安平壺應來自複數的窯場，前述福建邵武青雲後門山窯址，是現今唯一經確認燒造有安平壺的窯場，該窯燒製的作品屬中型薄胎灰白釉類型。（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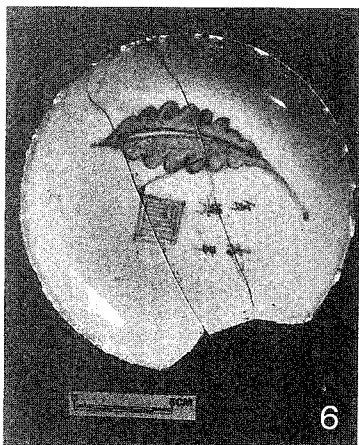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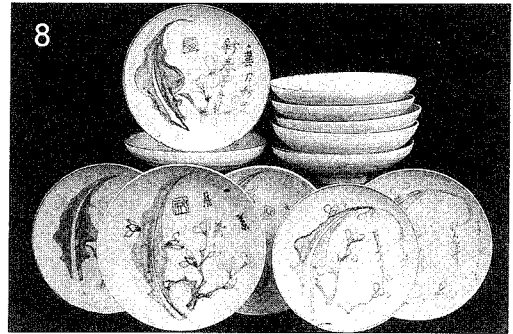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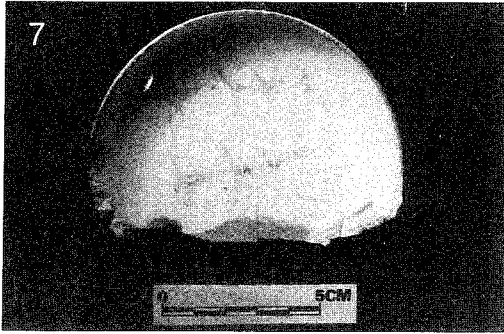
### 三、關於「太平年興」題記和「宣明」款青花瓷器的問題

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兩處探方所出土青花瓷器，計一千四百餘片，約佔出土遺址歷史時期陶瓷總數的四成。就報告書所揭載的圖版看來，青花瓷的年代跨幅頗大，既有早自十七世紀的遺物，也包括了二十世紀初，晚近時期的作品。由於報告書並未詳細提示個別作品的出土層位，及具體的遺物共伴情況，同時也缺乏以中國為主的紀年墓葬資料等的比對材料，因此目前仍難針對舊城聚落遺址所出土大量的青花瓷器進行編年。不過，遺址所出兩件饒富趣味帶有題記的

青花葉紋盤，則提供其燒造年代的珍貴線索。兩件盤均於口沿以鐵汁施加褐邊形成鐵口，其中一件於內壁飾一葉片及「太平年興」雙行草體題記，題記下方另描繪一狀似帶框福字，但雙重方框印銘已難正確判讀。（圖六）另一件殘缺較甚，但仍可從殘片清楚地觀察到青花葉紋旁有「太平年興、乙卯冬記」雙行題記。（圖七）另從報告書揭載的圖版可知，類似的青花葉紋盤標本，至少還有兩件，但不知是否亦帶有題記。<sup>(8)</sup>



(8) 臧振華，前引文，圖版 25、26、40。



以葉紋兼題記做爲主要的裝飾內容，是十七世紀清代初期青花瓷器常見的繪飾題材之一。如前引伴出有安平壺的一六九〇年代頭頓號沈船，即發現有不少該類青花盤。後者器形與舊城聚落出土作品相近，口沿亦施加褐邊，但盤內壁除有葉紋和題記之外，另繪一折枝花葉，可分二式，一式於枝葉旁書「一葉傳芳」，並繪一單方框「秋」字印記；另一式則題曰：「一葉約秋氣，新春再芳菲」，部份該式作品另鈐一單方框「福」字印。<sup>(9)</sup>（圖八）此外，八〇年代初江西省南昌市發掘的一處窖藏，也出土了幾件器形與舊城聚落同類作品相近，且同樣於口沿施加褐邊的青花葉紋題記盤，題記內容包括：「梧桐一葉落，天下盡皆秋」和「紅葉傳書信，寄與薄情人」。<sup>(10)</sup> 從伴出陶瓷的造型裝飾，及部份作品底足粘有墊砂等具有時代特徵的燒製技法，我同意報告者將窖藏的年代定爲明末至清康熙年間的看法。其次，從窖藏伴出有「康熙年製」款青花龍紋杯等作品看來，其又以康熙時期的可能性最大。結合前述頭頓號沈船紀年資料，則舊城聚落所出「太平年興、乙卯冬記」青花葉紋盤上之乙卯干支，很有可能爲 1675 年（清康熙乙卯年），而該一年代恰巧與同遺址所出，推測屬十七世紀後半的厚胎安平壺之年代，不謀而合。

其實，左營舊城聚落遺址，也出土有其他類型的十七世紀青花瓷器。如一類以略呈灰暗色調的青花鈔料，於器外壁繪減筆纏枝菊花紋的深腹碗，<sup>(11)</sup>（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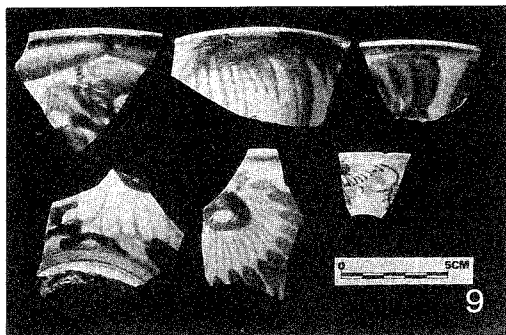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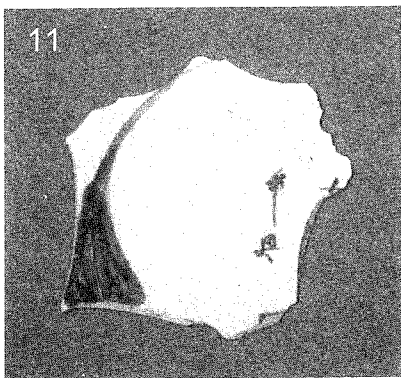
(9) Christie's Amsterdam B. V., *The Vung Tau Cargo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Amsterdam: Christie's, 1992), nos. 883-886.

(10) 余家棟，〈江西南昌發現一批窖藏瓷器〉，《文物》8（1984），圖版 5 之 7。

(11) 臧振華，前引文，圖版 27、28。

其造型、紋飾或圈足形式等各方面，均與福建翰苑的窯尾窰窯址標本，頗為類似，<sup>(12)</sup>（圖十）而窯尾窰窯的該類青花寫意纏枝菊花碗，則又和六〇年代同省晉江縣 1696 年（清康熙三十五年）水師提督施琅墓出土作品完全一致，<sup>(13)</sup> 看來舊城聚落遺址所出同類碗之相對年代，也應屬於這一時期。值得

10



得一提的是，同屬福建安溪窰系的龍涓珠塔窰，也生產有青花葉紋題記盤。龍涓珠塔窰的該類青花盤繪飾題材內容豐富，既有與頭頓號沈船完全相同，於葉片旁

另飾折枝花，且青花發色淺淡的作品；也有僅於葉片旁書：「太□年興」，下方另繪一方印記，青花色調濃豔的作品，（圖十一）後者則與舊城聚落遺址作品一致。就目前的資料看來，頭頓號沈船和舊城聚落所見青花葉紋盤，雖有較大可能來自安溪地區的窰場，不過若考慮到近年發現的福建平和縣漳州窰系之五寨鄉通坑窰，曾出土器形既相近，口沿亦施褐邊，內底書「一葉傳芳，合興佳器」字樣的葉紋盤；<sup>(14)</sup> 廣東水尾窰址，也發現了帶「太平年興」題記的青花葉紋盤，<sup>(15)</sup> 則這類流行於十七世紀中國沿海各省的青花盤的精確產地比定，似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資料來解決。

另一方面，這類具有吉祥意涵、詩情畫意的流行題材，也影響到日本九州佐賀縣有田町一帶窰場燒造的所謂「肥前瓷器」。如佐賀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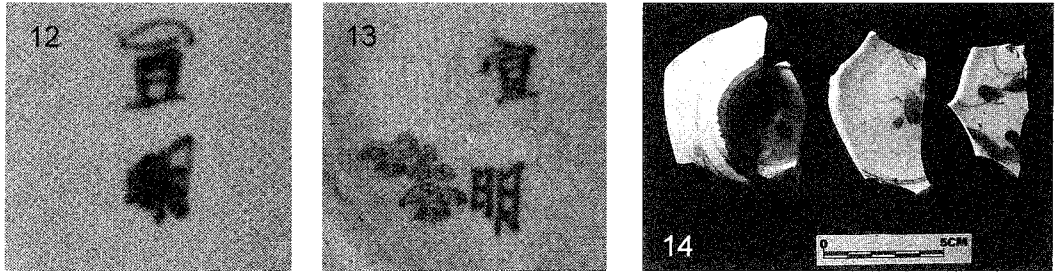
(12) 安溪縣文化館（葉清琳），〈福建安溪古窰址調查〉，《文物》7（1977），頁63圖12之2。

(13) 葉清琳，〈安溪青花瓷器的初步研究〉，收入 Ho Chui mei edited, *Ancient Ceramic Kiln Technology in Asia*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0), p. 81.

(14) 以上為筆者實見，標本藏於平和縣文化館。

(15) 楊少祥，〈廣東青花瓷器初探〉，收入 Ho Chui mei edited, 前引書，頁4圖版1之8。





撰分遺跡或東京都舊芝離宮庭園遺跡，都曾出土該類青花葉紋盤，後者亦帶題記，時代相當於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中期。<sup>(16)</sup> 眾所周知，清廷為杜絕海上走私貿易，同時企圖孤立鄭氏集團，既於 1656 年頒行海禁令，又在 1661 年採取了強硬的遷界措施，對中國陶瓷的海外輸出事業造成不小的影響。相對的，有田瓷窯場自 1659 年（日萬治二年）接受出島荷蘭商館定製燒造三萬餘件瓷器以來，已正式邁入蓬勃的外銷時代，並逐漸取代中國原有的海外陶瓷市場。<sup>(17)</sup> 早在十七世紀初，有田瓷窯由朝鮮歸化陶工李參平研製瓷器成功，旋即以明末青花瓷或《八種畫譜》等繪本，做為主要的模倣參考依據，燒造出在裝飾作風上與中國陶瓷異曲同工的作品。<sup>(18)</sup> 不僅如此，佐賀縣山內町燒瓷於十七世紀三〇年代至五〇年代的窯ノ辻窯，更出現了書寫「大明成化年製」等中國年號的作品。隨著十七世紀後半肥前瓷器的大量外銷，作品的銘款種類也趨於豐富，除了有「大明嘉靖年製」、「宣德年製」、「大明年製」等之外，更出現了將宣德的「宣」字、大明之「明」字兩者複合而成的「宣明年製」，或只書「宣明」的合成款識。<sup>(19)</sup>（圖十二、十三）後者「宣明」款青花標本於舊城聚落遺址亦曾出土。<sup>(20)</sup>（圖十四）從佐賀縣

(16) 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國內出土の肥前陶磁》（佐賀縣：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1984），頁 80 圖 858、頁 121 圖 243。前者撰分遺跡標本屬一七〇〇～一七八〇年代作品；後者舊芝離宮庭園遺跡標本被定年於一七〇〇～一七六〇年代之間。本文據近年大橋康二，〈肥前磁器の交流諸問題〉，《東洋陶磁》25（1996），頁 33 將舊芝離宮庭園出土標本的年代定於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前半。

(17) 西田宏子，《古伊萬里》（日本陶磁全集 23，東京：中央公論社，1976），頁 54～55。

(18) 矢部良明，〈初期伊萬里染付の起源と展開——中國陶磁との關連——〉，《世界陶磁全集》，8 卷（東京：小學館，1978），頁 157。

(19) 大橋康二，〈十七世紀後半における肥前磁器の銘款について——長吉谷窯出土品を中心として——〉，《東洋陶磁》17（1989），頁 25～27。

(20) 臧振華，前引文，圖版 11。

有田町長吉谷窯所見帶有該一款識青花碗的編年可知，其時代約在十七世紀六〇年代至八〇年代之間，<sup>(21)</sup> 亦即屬於清廷實施遷界令（1661年），日本瓷器趁虛而入取代中國陶瓷海外市場，至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清軍進攻台灣，鄭克塽戰敗投降，翌年頒佈展海令允許沿海人民出海貿易之間的作品。台灣出土有十七世紀後半肥前瓷器一事，既透露了當時台灣與日本之間交往的重要史實，也為研究肥前瓷器的海外輸出，提供了一處前所未有的考古遺址，值得重視。

#### 四、遺址出土「褐釉粗陶」的產地釐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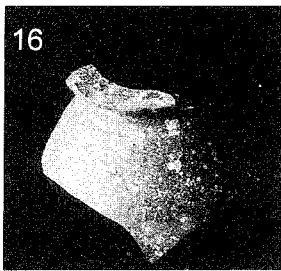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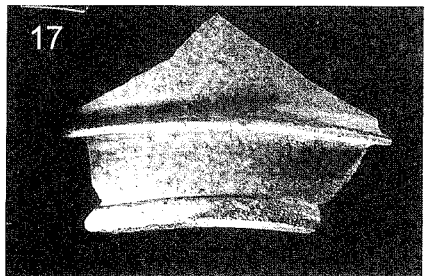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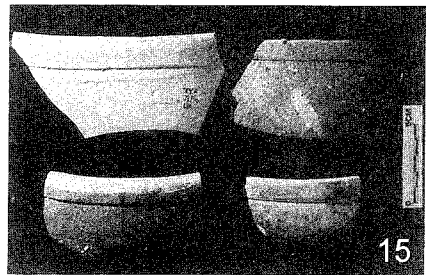
舊城聚落遺址除了出土有安平壺和青花瓷器等作品之外，另伴出了二百餘片報告書所稱的褐釉粗陶標本。就報告書圖版揭示的所謂褐釉粗陶而言，至少包括了無釉唇口素燒陶盆、（圖十五）褐釉平口罐、（圖十六）和褐釉雙簷罐（圖十七）等各類作品。

<sup>(22)</sup> 其中，褐釉平口罐於傳台南出土現歸台南市歷史館收藏作品中也可見到；同類的作

品，並曾出土於日本中世著名貿易港堺環壕都市遺跡。（圖十八）

後者出土於1615

年（日慶長二十年）燒土層，一般認為是越南所燒製的外銷陶瓷。<sup>(23)</sup> 其次，越南頭頓巴麗亞省(Baria-Vung Tau)



(21) 大橋康二，《肥前陶磁》（考古學ライブラリー55，東京：ニューサイエンス社，1989），頁70。

(22) 臧振華，前引文，圖版94、96、98右上。

(23) 續伸一郎，〈堺環壕都市遺跡出土の貿易陶磁(1)——出土陶器の分類を中心として〉，《貿易陶磁研究》10（1990），頁148、頁147圖4之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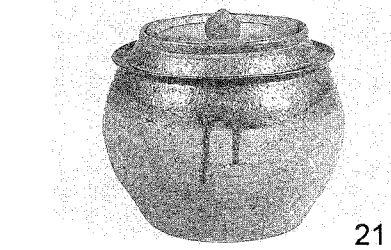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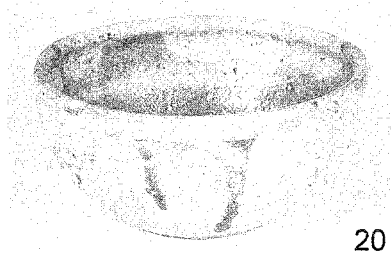


化德島 (Condao) 一處推測是十八世紀初荷蘭東印度公司設施的遺址中，也採集到不少同類褐釉平口罐標本，(圖十九)而該遺址也伴出了安平壺，以及十七世紀末期的其他中國陶瓷。<sup>(24)</sup> 安平壺與褐釉平口罐的共伴組合同時見於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是應予留意的現象。

此外，舊城聚落遺址出土的唇口素燒陶盆



和褐雙簷罐，亦見於國外公私收藏，(圖二十、二十一)日本學者依其胎釉等特徵，認為其亦屬越南陶瓷。<sup>(25)</sup> 同類的唇口素燒陶盆於台灣經常可見，除出土地點不明的私人收藏品之外，於外島澎湖和台灣海峽亦曾發現。<sup>(26)</sup> 由於越南本土的窯址發掘調查工作，至今未能全面展開，故有關舊城聚落等地遺址出土的褐釉平口罐等作品的產地，目前仍限於從作品本身的外觀特徵進行間接的釐測，未有明確的窯址出土資料可資比對，特別是常見於台灣各地遺跡的唇口素燒陶盆，是否確屬越南所燒製？頗有討論的餘地。其次，近年來於寧滬高速公路蘇州段清代初期墓葬 (D125M3) 中也出土了與舊城聚落遺址所見褐釉



(24) 森本朝子，〈日本出土のベトナムの陶磁とその産地〉，《東洋陶磁》23、24 (1995)，頁49、頁64圖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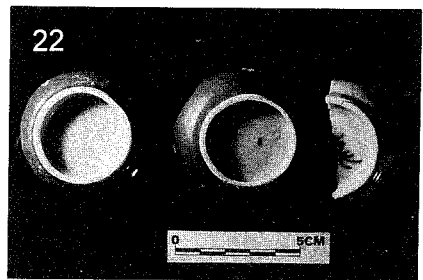
(25) 根津美術館，〈南蠻島物——南海請來の茶陶〉(東京：根津美術館，1993)，圖33、44、123等。

(26) 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所藏標本。另，國立歷史博物館，〈澎湖海域古沈船發掘初勘報告書〉(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6)，頁119。

平口罐造型類似的作品，<sup>(27)</sup> 後者胎釉特徵不明，但提示了中國於清代初期也曾燒製相近器形的陶瓷。儘管如此，如果考慮到台灣在當時南海貿易中的樞紐地理位置，以及舊城聚落傳說是鄭成功所設軍屯前鋒尾的所在地，而鄭氏亦積極參與東南亞的貿易等看來，若說台灣出土有越南等東南亞陶瓷，無寧是極為自然的事。事實上，就個人的實際見聞而言，台南地區的古董舖偶可見到據說是台灣海峽打撈上岸的越南青花和泰國鐵繪瓷；台南市立安平文化中心也陳列有年代可早自十五世紀的越南青花大盤，後者據說亦得自台灣海峽。此外，日本學者亦曾提到在開鑿台南、安平之間運河時，曾出土大量的泰國青瓷，<sup>(28)</sup> 可惜詳情不明。

## 五、小結

傳說是鄭成功所設軍屯前鋒尾所在地的高雄縣左營清代鳳山舊城聚落遺址，同時出土有十七世紀的中國和日本瓷器，以及推測屬越南燒製的陶瓷，是值得留意的現象。相對於中國大陸遺跡未能見到這樣的陶瓷出土組合，類似的伴隨有安平壺和越南陶瓷的遺址，以往曾見於日本長崎市榮町，<sup>(29)</sup> 和推測可能與十八世紀初荷蘭東印度公司設施有關的越南頭頓巴麗亞省化德島等地遺跡。<sup>(30)</sup> 其次，舊城聚落遺址還見有一類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窯場所生產的於器外壁施褐釉，內壁繪飾青花的作品。<sup>(31)</sup> (圖二十二) 由於該類作品常經由巴達維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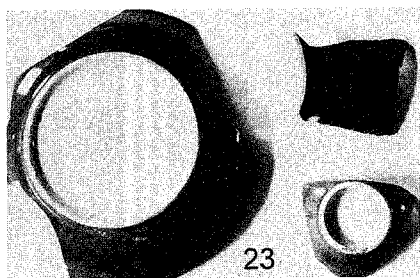
(27) 蘇州段考古隊(丁金龍等)，〈寧滬高速公路蘇州段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收入《通古達今之路——寧滬高速公路(江蘇段)考古發掘報告文集》(《東南文化》增刊二號，南京：南京博物院，1994)，頁186圖13之9。

(28) 小西雅德，〈タイ陶磁器の輸出地域について〉，《國學院大學考古資料館紀要》3(樋口清之博士喜壽紀念，1987)，頁228。

(29) 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榮町遺跡——ビル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市：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1993)，參見圖版15~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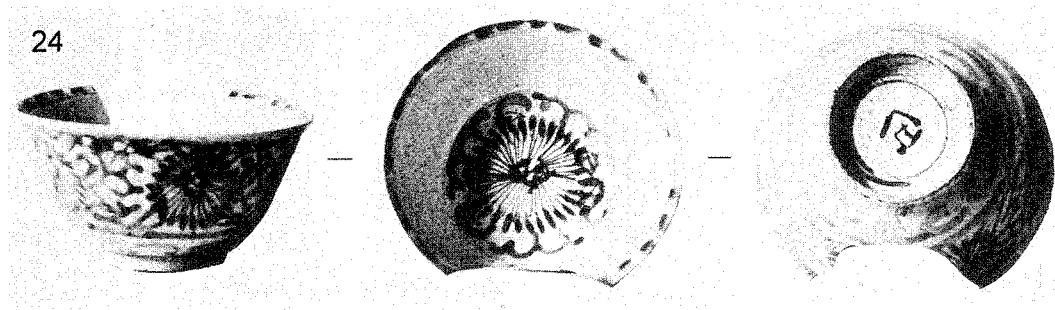
(30) 森本朝子，前引文，頁49。

(31) 臧振華，前引文，圖版32。



轉販各地，故又被稱為巴達維亞瓷（Batavia ware），而前已提及的位於中島川與銅座川匯流入長崎港的要衝，對岸即出島荷蘭商館的日本長崎市銅座町遺跡，既出土了這類作品，<sup>(32)</sup> 同時伴出了安平壺和肥前瓷器，其陶瓷的組合情況和舊城聚落所見標本頗有共通之處。此外，發掘雅加達灣西部沿岸叭沙伊

干（Pasar Ikan）荷蘭東印度公司倉庫群和舊河道遺跡時，除出土有所謂的巴達維亞瓷（圖二十三）和肥前瓷器，伴出的青花菊花纏枝碗，也和前述舊城聚落同類作品一致。<sup>(33)</sup>（圖二十四）這樣看來，舊城聚落遺址出土，屬於十七世紀的陶瓷組合特徵，雖與中國方面遺跡所見者截然不同，卻和日本或東南亞地區遺址所出作品組合有共通之處，而日本和東南亞遺跡有的又與荷蘭東印度公司遺構有關，



結合當時東南亞情勢，舊城聚落遺址之陶瓷組合情況，或可說是當時以台灣為據點的東亞貿易交流於考古學上的反映。

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由於台灣的地理位置，不僅是中日貿易或日本航向南洋的重要基地，也成為中國船隻前往菲律賓或順著黑潮往返於墨西哥、菲律賓的西班牙船等諸航路上的據點之一；十七世紀的台灣更是荷蘭人和鄭成功往來於

(32) 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銅座町遺跡——十八銀行本店敷地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市：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1993），圖版10之63。

(33) 三上次男，〈パサリカン遺跡出土の貿易陶磁〉，《貿易陶磁研究》2（1982），圖12～15。

日本和東南亞貿易商船的主要轉運站。<sup>(34)</sup> 據沃克 ( T. Volker ) 《瓷器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一書所載，自 1624 年荷蘭人於台南設置貿易據點，迄 1657 年因中國基本停止供應陶瓷轉而向日本購買瓷器的近三十年間，經由台灣轉送巴達維亞銷往歐洲的中國陶瓷總數達數百萬件之多。不僅如此，由台灣運往日本的中國陶瓷數量亦頗可觀，如 1635 年 8 月有裝載著十三萬五千餘件陶瓷的船隻，由台灣出發赴日本。<sup>(35)</sup> 另一方面，日本自一六五〇年代以來，窯業迅速擴張並一度取代了中國陶瓷原有的海外市場，也經常是以台灣為據點而後轉運至東南亞和其他地區。如 1661 年 12 月由出島經台灣航向巴達維亞的船隻裝載有瓷器三萬八千餘件；1669 年 11 月有一萬八千餘件陶瓷由出島運抵台灣；1682 年出島駛往台灣的船隻也裝運有一千餘件另四百包的陶瓷器。<sup>(36)</sup> 眾所周知，鄭成功是在 1661 年登陸台灣，翌年 2 月與荷蘭簽訂開城協約，驅逐了荷蘭在台勢力，至 1685 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清軍大舉進攻台灣，鄭克塽戰敗投降，鄭氏祖孫三代在台灣共二十二年（1661 ~ 1683 年）。因此，不能排除前引一六六〇年代至八〇年代初期，由日本運往台灣的陶瓷交易或有可能是由鄭氏集團所主導。無論如何，舊城聚落遺址出土的十七世紀六〇年代至八〇年代的「宣明」款肥前青花瓷器，既透露出台灣據點之於日本外銷瓷業所曾經扮演的積極角色，也提供了理解鄭氏貿易內容的珍貴線索。

事實上，近年來學者已經懷疑日本肥前瓷器的海外輸出，與鄭氏集團關係密切，在肥前瓷器的外銷盛期（1650 ~ 1682 年），由中國船所運送的肥前瓷器數量要遠高於荷蘭船。<sup>(37)</sup> 而鄭氏也曾介入經營南洋貿易，如《熱蘭遮城日誌》1655 年 3 月 9 日條，有從安海來台灣的船隻所獲消息稱，有二十四艘國姓爺的船隻由中國沿海赴各地貿易，其中有兩艘赴東京（越南北部），四艘抵廣東（越南中部）；<sup>(38)</sup>

(34) 曹永和，〈環シナ海域交流史における台灣と日本〉，箭内健次編，《鎖國日本と國際交流》（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頁 625、631。

(35) T. Volker 著，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之（25），《陶說》344（1981），頁 71。

(36) T. Volker 著，前田正明譯，前引書之（29），《陶說》349（1982），頁 66；之（32），《陶說》352（1982），頁 68；之（35），《陶說》356（1982），頁 64。

(37) 坂井隆，〈肥前陶磁の輸出と鄭氏・バンテン王國〉，《東南アジア—歴史と文化—》22（1993），頁 67 ~ 91。

(38) 曹永和，〈從荷蘭文獻談鄭成功之研究〉，《台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社，1979），頁 377。

《十七世紀台灣英國貿易史料》也記載：「台灣王有五至六只船，每年 1 月開往馬尼拉，在或 5 月開回，然後開往日本。<sup>(39)</sup> 在此之前，以僑寓日本平戶的華人領袖李且為首的日本朱印船，亦經常往返於台灣和南洋進行貿易。<sup>(40)</sup> 因此，儘管目前已難確認舊城聚落遺址出土的，推測屬越南所生產的陶瓷，到底是由何人攜入台灣，若考慮到日本當時獲取南洋物資的途徑，或可推測日本出土的東南亞陶瓷當中，可能有一部份是經由台灣而後轉送到日本的。舊城聚落遺址中的肥前瓷器，和中國沿海地區瓷窯作品，以及疑是越南陶瓷的出土組合，不僅是十七世紀以台灣為據點之一的東亞貿易史的縮影，「宣明」款青花瓷器的出土似乎也提示了鄭氏集團曾在清廷實施遷界令（1661 年），至頒行展海令（1684 年）之間，即肥前瓷器的輸出盛期，以台灣為據點介入了日本陶瓷的外銷事業。總之，就遺址出土部份陶瓷的相對年代及組合特徵看來，以往認為高雄縣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是鄭氏所設軍屯前鋒尾之所在的傳說，或許並非無稽之談。

最後，我應聲明，以上補記有部份內容與數年前發表的拙文雷同，這是為了避免行文時過於突兀，有略作背景交待的必要，不得已才採行的權宜書寫方式，請讀者海涵。

表三 中國和台灣以外遺跡所見安平壺

編號	發現地	時代	數量	備註及文獻出處
1	南洋		1	韓槐準，《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新加坡：青年書店，1960）
2	印尼（Sumatera）		1+	Sumarah A dhyatman, <i>Antique Ceramics Found in Indonesia</i> (Jakarta: The ceramics society of Indonesia, 1981)
3	聖海倫那島（St.Helena） 白獅號（Witte Leeuw）沈船	1613 年	2	G.L. Vander Pijl-Ketel, <i>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i> (Amsterdam: Rijks Museum, 1982)
4	馬來西亞		1	Southeast Asian Ceramic Society, <i>A Ceramic Legacy of Asia's Maritime Trade</i> (Malaysia: the Southeast Asian ceramic Society, 1985).

(39) 林仁川，〈試論著名海商鄭氏的興衰〉，鄭成功研究學術討論會學術組編，《鄭成功研究論文選續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頁 197。

(40) 岩生成一，〈明末日本僑寓支那人甲必丹李旦考〉，《東洋學報》23：3（1936），頁 78～79。

編號	發現地	時代	數量	備註及文獻出處
5	日本長崎市出島荷蘭商館 (IX區)	1634年～	1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國指定史跡出島和蘭商館跡範圍確認調查報告書》(長崎市：長崎市教育委員會，1986)
6	日本長崎市出島荷蘭商館 (X區)	1634年～	1	(同上)
7	日本平戶市荷蘭商館邊牆土城 (D層)	1613～1618年	1	平戶市教育委員會，《平戶和蘭商館跡—現狀變更(家屋改築)に伴う發掘調査の報告—》(平戶市：平戶市教育委員會，1988)
8	哈察號 (Hatcher Juck) 沈船	1640年代	?	S. J. Vainker, <i>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i>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91)
9	日本長崎市萬才町 (松尾宅遺跡)		1	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査協議會，《朝日新聞社長崎支局敷地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査報告書》(長崎市：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査協議會，1992)
10	越南頭頓號 (Vung Tau Cargo) 沈船	1690年代	17+	Christie's, Amsterdam B. V., <i>The Vung Tau Cargo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i> (Amsterdam: Christie's, 1992).
11	日本長崎市銅座町		2	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査協議會，《銅座町遺跡十八銀行本店敷地埋藏文化財發掘報告書》(長崎市：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査協議會，1993)
12	日本長崎市榮町 (29號探方)		1	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査協議會，《榮町遺跡—ビル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調査報告書—》(長崎市：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査協議會，1993)
13	日本長崎市榮町 (56號探方)		1	同上
14	菲律賓聖迭戈號 (San Diego) 沈船	1600年	3	Jesus T. Peralta, <i>Saga of the San Diego, Philippines</i> (Manila: National Museum Philippines, 1993).
15	印尼 (Banten Lama)		31	大橋康二等，《アジアの海と伊萬里》(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94)
16	日本天草河浦町崎津小高濱 (小濱寶遺跡)		1	罐內置骨質聖母瑪麗亞像。《天草切支丹館資料目錄》，轉引自，坂井隆，《東南アジア考古學》15 (1995)
17	日本長崎市内遺跡		2	坂井隆，《東南アジア考古學》15 (1995)；另同氏，《東南アジア—歴史と文化—》25 (1996)
18	日本長崎市内遺跡		9	同上 (1995)
19	越南順化 (Hue)		?	同上 (1995)
20	越南會安 (Hoi An)		?	同上 (1995)；另，菊池誠一，《東国史論》12 (1997)
21	越南化德島 (Con Dao)	1686～1702年	5	森本朝子，《東洋陶磁》23、24 (1995)
22	印尼 (Banten Girang)	～1682年	?	坂井隆，《東南アジア考古學》15 (1995)
23	印尼 (Tirtayasa)	1660～1682年	1	同上
24	印尼 (Selayar)		?	同上
25	日本長崎市築町遺跡 (I區燒土1層)	～1663年	2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築町遺跡—築町別館跡地開發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査報告書—》(長崎市：長崎市教育委員會，1997)。其中一件內裝填鐵屑。